

农村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研究:进展、局限与启示

王睿^{a,b},林建^b

(重庆大学 a. 公共管理学院;b.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重庆 400044)

摘要:农村小额信贷的激励机制对促进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文章分别从团体贷款(自我选择、共同监督、强制还款)、动态激励(持续融资、利率激励)、周期还款、社会资本等方面系统分析农村小额信贷对于提高还款率的机理和作用,以期为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小额信贷;激励机制;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3-0044-07

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通常面临甄别、监督、还款三大问题。为了向农村提供廉价贷款,发展中国家往往采取补贴利率或提供抵押担保的方式来缓解农村信贷的不足。这种方法在初期是成功的,但却只是推迟了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抵押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些国际组织推动之下,小额信贷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为解决农村信贷市场的缺陷和消除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无论小额信贷机构是以关注对目标群体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善为特点的福利主义(Welfarist),还是强调运营和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为机构生存的必要条件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其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机构的重要目标^①。因此,如何实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近20年来小额信贷理论研究的主要脉络。建立和完善贷款的偿还机制是实现机构在财务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激励机制则是实现高还款率的有效保障。随着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在孟加拉国的成功,其特有的激励机制成功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在保证机构高还款率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系统地介绍激励机制在农村小额信贷发挥的作用,笔者在对近年来农村小额信贷特有的激励机制进行归纳和概述的基础上,从团体贷款的自我选择、共同监督、强制还款三方面分析其如何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化解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从持续融资、利率激励两方面讨论动态激励机制和周期还款对激励机制的影响并提出早期研究的局限和不足。最后从研究的新趋势出发,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及对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政策启示。

一、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作用机理

(一) 团体贷款机制

团体贷款的优势在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机构可以通过利用成员间彼此熟悉的环境以及借款者的个人声誉,在提高小组成员违约成本的同时大大降低

收稿日期:2011-1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内陆山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研究”(09BJY032)

作者简介:王睿(1982-),男,重庆人,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博士,主要从事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尽管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对于小额信贷的目标有所差异,对机构的可持续性发展逐渐得到了广泛认同,其差别只是对可持续发展关注的程度不同。

交易成本,其形成的连带责任机制也避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即使连带责任具有较高的监督成本时,团体贷款同样比个人贷款具有优势^[1]。并且,连带责任合约相对于个人贷款合约与借款人的家庭财富呈现出U型关系,其更有利于财富的扩散^[2]。连带责任的作用可归纳为:(1)确定贷款人风险程度从而克服逆向选择;(2)确保资金的正常使用防止事前道德风险;(3)确保贷款人在违约时能够告知无法还款的正确信息以确保监督的有效;(4)当贷款人恶意拖欠时强制其还款以避免事后的道德风险^[3]。Gangopadhyay等^[4]发现如果小组成员发生违约,那么小组的其他成员将为了逃避更高的惩罚而声称其项目失败的借款人是成功的,并支付利息而不是帮其支付贷款和承担连带责任。作者引入了一个新的约束变量,即共同责任的惩罚金额不能超过个人责任。研究显示,尽管有了这个约束条件,其共同责任仍旧可以提高还款率和个人福利。特别地,当风险型偏好的借款人达到其福利的最佳水平时,由于约束条件的增加,其安全偏好的借款人将不会达到最佳福利。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连带责任降低了违约的流动性风险,但同时也提高了成员间搭便车的风险。在静态情况下,发生“搭便车”的概率将大于流动性风险,从而使得团体贷款并不具有任何优势,但是当贷款是一个重复过程时,连带责任所产生的共同监督以及制裁对还款率的提高仍将远大于个人贷款^[5]。Klaus Abbink等^[6]也认为由团体所带来的搭便车会因风险的扩散而得到缓解。

1. 自我选择

由于同一地区的借款人对彼此之间的风险类型都相互了解,连带责任的产生将诱使贷款者在形成小组前对同组成员的能力、信誉、资产等方面有效评估后进行同质配对,从而形成一个共同承担责任的集体信誉。尽管所有贷款小组面临着同样的利率,但同质配对意味着低风险的小组在以较低的价格来支付实际的贷款利率的同时也能够降低其他相关成本,而这又反过来可以促使低风险成员进入信贷市场参与活动。Van Tassel^[7]以连带责任贷款合约对象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团体贷款机制进行了考察。作者建立了一个单期博弈模型分析了借款机构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最优贷款合约。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连带责任作为一种甄别机制可以使不同类型的贷款人进行自我选择以及形成团体结构的内生性。与此同时,成员间自我选择也导致了不同类型的借款人对其预期成本不尽相同,而相同偏好的贷款人组合也使得小组的外部性内生性从而产生人以群分的匹配效应(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进而实现信贷市场的分离均衡^[8]。在这样的机制下,最终将形成较低的均衡利率从而达到优于个人贷款

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2. 共同监督

由于组内的成员比局外人更具有信息优势,其监督成本也相对较低,连带责任促使小组成员对彼此之间的投资决定和努力程度进行监督,因而降低了机构的监督成本,缓解了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因此,团体贷款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在信息和监督方面的优势。但如果组内成员间的监督成本过于高昂,也会对团体贷款的效果产生影响。尽管共同监督本身并不能完全保证借款人还款,但它可以让贷款机构以及小组成员了解到谁未还款,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Remco van Eijkel等^[9]认为由于借款人对自己在组内未来的期望收入具有差异以及受搭便车行为(如果个体增加对组内成员的监督,相应地其他人会降低自己的努力程度)的影响,使得个体间对监督付出的努力程度往往也不一致。为了确保将来能够继续获得贷款支持,对未来收入期望较高的个体往往会付出更高的监督努力,这使得小组的部分成员自愿成为小组组长。也就是说,团体贷款的小组组长对其他成员的监督水平要高于成员间的相互监督。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还款率的提高。Timothy N. Cason等^[10]比较了在持续融资和同时借款下的团体贷款的共同监督以及由机构监督的个人贷款。他发现监督成本的高低对于更好地选择贷款类型有着重要的作用。共同监督对于机构监督的成本优势使其无论是在贷款频率、监督的有效性还是在还款表现上都优于机构监督。如果没有监督成本的差异时,团体贷款对于个人贷款并不具有任何优势。

3. 强制还款

在成员间彼此了解的情况下,小组成员可以利用组内压力在抵押品不能发挥作用时比贷款机构更加有效地强迫拖欠者还款(惩罚故意违约者)并减少事后的道德风险(Ex - Post Moral Hazard)。Besley和Coate^[11]在博弈论框架下建立了基于社会制裁的还款博弈模型。他发现团体贷款促进还款率的提高取决于成员间是否具有潜在的社会制裁。只有当社会制裁足够大时,团体贷款才能克服与之相关的道德风险。而在成员间不具有社会制裁约束时,团体贷款对于其他模式来讲可能没有任何优势。如果团体成员能充分利用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担保”(Social Collateral),则可部分消除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Ahlin和Townsend^[12]研究了社会制裁分别在曼谷附近的富裕中部地区和泰国东北部贫困地区的重要影响。作者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员间连带责任强度与还款表现呈现出负相关关系^②,而社会制裁对还款率具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地,作者发现策略性违约(Strategic Default)可能在基础设

^②与先前的文献不同,作者使用的是固定的贷款利率。

施较差的贫困地区较为普遍^③,而逆向选择问题可能多发生于较发达地区^④。Dominik^[13]研究了渐进式贷款(Progressive Lending)作为一种强制机制对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作用。他发现即使在没有抵押品和强制还款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情况下,把项目拆分成若干子项目后也能获得贷款,只有当他们返还第一阶段的贷款时才能获得第二阶段的贷款。通过贷款额度的增加,为了保持对借款人的还款压力,更多利润更大的项目被转移到了第二阶段。

(二) 动态激励机制

一般来讲,动态激励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借款人如约按时还款,那么可以继续获得信贷支持;另外一类是在第一类基础上,随着借款人“信用”的提高,机构还提供了诸如增加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等相关激励措施。也就是说动态激励最大的特点是将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行为演变为一个动态的重复博弈过程,由于机构对未来贷款的终止对借款人来讲是一个可置信的威胁,因此,借款人会选择低风险的项目以及减少违约行为。特别地,即使在没有连带责任和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动态和渐进的贷款也能够促进还款^[14]。Karlán 和 Zinman^[15]在南非进行了随机对照实验,他们设计出3个不同层面的独立的随机利率并直接给公司之前的信贷客户发送邮件,这样的设计使选择相同利率的借款人面临着不同的还款激励,而选择不同利率的借款人将面临着相同的激励。他们发现具有动态激励的借款人保持着良好的还款记录。实际上,如果机构能够采取内生化的违约惩罚机制增加贷款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博弈次数,那么就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各种风险。这也意味着借款人现阶段的违约并不代表其同时也丧失了在未来获取贷款的机会。如果借款人能够积极地提高还款能力,那么机构也会采取降低利率以及实施更加灵活的惩罚期限来扩大贷款的广度和深度^[14]。

1. 持续融资

持续融资(Sequential Financing)对于提高机构的收益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持续融资产生的激励机制促使借款人为了获得下一次贷款而不得不降低违约意愿和更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机构可以通过对借款人在第一阶段的表现更容易地对借款人的类型进行鉴别。在有限信息条件下非正式信贷市场中,受借款人异质型类型的影响,机构往往不能对借款人之前的贷款历史进行有效观察从而导致高违约率风险。而当市场上存在一定数量的“自然违约人”时,其会达到一个唯一均衡的“微观配给(Micro-Rationing)”机制,也就是这个均衡将导致机构会在借款人第一次借款时采取一个较小的信用额度(有可能是高利率),随着信用的建立和信贷关系的持

续,其授信额度将会得以增加^[16]。Kumar Aniket^[17]发现持续融资能够帮助机构减少缺少抵押的借款人的经济租金,而借款人可以通过监督对小组其他成员的努力程度产生影响,从而克服道德风险的影响。

Chowdhury^[18]通过建立基于共同监督和道德风险的团体贷款模型发现,单纯的连带责任并不能解决事前的道德风险问题。在缺乏持续融资或者借款人监督的情况下团体贷款可能会因监督不足造成投资损失。并且在缺乏连带责任的条件下,即使具有共同监督的团体贷款也不会取得相应的效果。而在缺乏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其具有持续融资的团体贷款会取得成功,但还款率却比较低,只有包括了持续融资、共同监督以及连带责任在内的团体贷款才能较好解决因监督不足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地,Chowdhury^[19]对 Varian 的模型进行了扩展,他通过建立基于社会资本的无限期动态模型,重点对动态贷款激励机制中“持续融资”和“或有再贷款”(Contingent Renewal)对团体贷款的影响以及它们利用社会资本的效能进行了考察。他发现当给定贴现因子足够大时,借款人可以利用人以群分的匹配效应(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以较低的成本对贷款小组的优劣进行判别,并且也可以有效地克服道德风险的影响以及防止由再贷款导致的合谋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在给定贴现因子足够小时,则会导致消极的匹配效应。Miriam Sinn^[20]分析了当贷款机构对违约的借款人缺乏有效约束时不同的贷款机制对于借款人策略性违约的影响。作者将持续融资对 Besley 和 Coate 模型的同时贷款的条件进行了替换,结果显示在缺乏正式的强制合约时,持续融资比同时贷款以及个人贷款具有更高的还款率。但随着正式的强制合约的加强,其作用也随之减弱。而如果强制合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同时贷款的还款率在三者之间最高。实际上,持续融资使得小组成员相互的共同监督和努力程度在时间上往往存在差异,机构可以通过对小组内部分个体的激励来实现对团体的激励相容。

2. 利率激励

利率对于机构筛选借款人以及对借款人行为的激励有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机构的期望收益取决于贷款利率和借款人还款概率的变化。机构的期望收益与利率的非单调性决定了其会选择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上拒绝部分借款人的要求以期达到收益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信贷配给,因此,单纯的利率并不能作为有效的甄别机制^[21]。而章元^[22]认为在借款人是风险中性的情况下,团体贷款的高利率会对借款人产生一种遴选效果,从而导致信贷配给发生扭转,使得即使在高利率下团体贷款也会取得成功。另外,机构还可以通过设定多样化的贷款

^③作者主要验证的是 Besley and Coate(1995)的模型。

^④作者主要验证的是 Ghatak, M., (1999)的模型。

合同来避免信贷配给的影响。例如,机构可以利用抵押物与利率组合,即给低风险偏好的借款人提供高抵押物 and 低利率的合同,给高风险偏好的借款人提供低抵押物和高利率的合同,利用贷款规模与利率变化的组合或者更加复杂的组合来对借款人的类型进行筛选和激励,从而实现不同类型借款人的分离均衡和帕累托效率的改进。

(三) 周期还款机制

周期还款的优点在于:(1)信贷人员能够对借款人资金运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有效地控制贷款规模,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2)帮助机构更好地寻求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借款人;(3)帮助借款人解决“储蓄约束”(Savings Constraints)^[23]。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灵活的还款周期不仅不会增加违约风险,反而会鼓励借款人进行长期投资以提高客户的还款能力。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影响,贷款机构通常会采用一个固定的还款时间以确保机构的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与此同时,周期性还款也能够促使借款人在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情况下形成定期储蓄的习惯。另外,频繁的会议机制也可以提高信贷人员与借款人之间的信任程度^[24]。Bhole 和 Ogden^[25]则认为在固定的动态合同下,当放宽团体贷款合约的某些约束时,也就是说如果能确定团体贷款合作违约方的最优惩罚金额或者能够对违约奖惩因人而异的话,那么即使没有相互汇报和社会制裁,灵活的团体贷款也比个人贷款具有优势。Michal Bauer 等^[26]利用时间贴现和风险规避实验对印度南部的 573 个村庄农户的金融活动进行了分析。作者发现农户对小额信贷的需求呈现出时间不一致偏好。具有双曲偏好^⑤的个体(尤其是妇女)更可能参与小额信贷活动^⑥。

二、早期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研究的局限

随着农村小额信贷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理论界逐步意识到,不同贷款技术和合同类型的使用会对借款人产生多方面影响,例如,强制还款机制可能会阻止借款人对较长投资周期项目的关注,而严格的还款时间、社会压力和制裁会导致借款人倾向于将贷款投入到短期回报的项目。另外,部分学者发现连带责任并不能完全解释小额信贷机制如何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Hisaki Kono^[27]通过对越南的实验发现连带责任合同导致了严重的“搭便车”行为,而且还促使了策略性违约和低还款率的发生。当小组成员能够观察到彼此的投资回报时,借款人更有可能选择策略性违约。尽管相互汇报机制和惩

罚制度的引入对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其比例仍高于个人贷款,而且连带责任也未能促进借款人之间的风险分担。实际上,认为当借款人之间能够充分交流时,连带责任导致了项目选择风险的增加。尽管连带责任能够增加成员的还款激励,但连带责任本身对于成员来讲也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连带责任有可能会扭曲对还款的激励。另外也可能造成一部分安全的贷款人退出市场,降低还款预期^[28]^⑦。与此同时,借款人之间的合谋行为也会影响机构的收益。Laffont 和 Rey^[29]的研究发现,如果借款人之间存在信息共享,无论合谋是否出现,其都能提高机构的还款效率,但如果不存在信息共享,无论借款人是否可以观察到相互的努力程度,借款人之间的合谋都会导致机构收益的降低^⑧。随着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与发展,近年来国外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如格莱珉银行)已逐渐放宽了连带责任要求,小组成员之间不再承担严格的连带责任义务,仅保留了部分诸如自我筛选、共同监督以及定期会议等制度设计。而团体贷款也仅仅意味着一些小组方面的流程或程序。相应地,学者们也将研究的重点从已有的连带责任机制逐渐转移至其他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研究的新进展

小额信贷激励机制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它有能力利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资本以克服信贷市场失灵产生^[30],其能够协助贷款小组获得贷款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社会资本演变成一种类似于抵押品或者具有良好信任的经济资源,成员间的社会资本提高成员间的相互合作,建立了信任、互惠以及潜在的社会制裁,弥补了个人金融资本的缺乏。Christiaan Grootaert 等^[31]在布基纳法索对社会资本在家庭福利的影响以及在促进贷款获得两方面调查发现,社会资本主要在信息共享、减少机会主义、提高集体决策能力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资本中成员密度以及机构内部的异质性对家庭福利影响最大。穷人以及拥有小块土地的家庭更容易从社会资本中获得更高回报。社会资本增加 5%,人均家庭支出将会提高 2.7%。而拥有越多社会资本的家庭拥有越高水平的人均家庭支出并更容易获得贷款。与其他资本形式相比,社会资本的分配更加公平。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社会资本对家庭福利的影响大约是 5~11 倍,效果更为显著^⑨。

社会资本根据社会网络、网络结构和强弱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不同种类。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

⑤投资者对近期的贴现率取值和对远期的贴现率取值完全不同,这种偏好被称为“双曲偏好”。

⑥虽然这一结果表明了借款人分期付款机制对于解决“储蓄约束”的重要性,但作者并未讨论周期还款的频率。

⑦Xavier Gine 等(2009)认为不管何种形式的贷款,动态激励都能够有效地降低项目的选择风险及违约率。

⑧在 Laffont 建立的分析框架下,代理人之间的合谋包括代理人是否具有高效率以及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是否存在合谋两种类型。

⑨这一结果与来自坦桑尼亚的研究一致,另外,作者对印度尼西亚和玻利维亚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影响比较接近。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布基纳法索和坦桑尼亚教育水平较低所致。

但不同种类间也是相互重叠的。因此,学者们也按照社会资本的不同类型分别进行了讨论。Pronyk等^[32]利用整群随机试验对南非8个村庄的小额信贷小组进行了干预研究,并同时考察了845个样本对象的年龄以及每个家庭妇女财产分配情况对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影响。作者认为,尽管具有较为宽泛的置信区间,干预组比对照组具有更高水平的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其社会与经济效益都显著增加,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外生途径得以强化。而 Benjamin 等^[33]则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内生性,他认为定期的小组会议增加了成员间的社会互动,而标准的贷款合约也潜在地加强了社会关系,增加了成员间的社会资本。因此,除了定期小组交流的外生性是提高小额信贷还款率的重要因素外,内生的社会资本同样对防止违约率有显著影响。Milada Kasarjyan 等^[34]利用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了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在亚美尼亚农村对具有连带责任个体还款表现的影响。作者发现具有较高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的个体其农业生产率也较高。与其他研究不同,Anni Heikkilä 等^[35]分别从个体和总体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在乌干达地区对信贷的作用以及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借款人选择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正式、半正式、非正式)和贷款来源(家庭、朋友、商店、高利贷)。作者发现借款人拥有的高质量和大数量的社会关系对借款人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对穷人尤为显著。人际间的信任从总体上并不是从机构获得贷款的关键因素。由于非正式机构往往不能对穷人实施正式合同的强制机制,非正式机构比正式机构更多地利用了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制裁的威胁,也就是说非正式机构能够基于潜在借款人拥有社会关系的质量和数量对其进行筛选,因此借款者的社会关系对于非正式机构而言比正式机构更为重要,而正式机构在其运行的地区有赖于较高水平的人际信任。

随着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还从其他方面对小额信贷的激励机制进行了解释。Chatterjee 和 Sarangi^[36]强调了贷款小组的性质和类型对于连带责任成功的重要影响。他们认为团体形成的成本取决于成员的社会身份,成员社会身份的差异将导致团体风险异质性的增加。忽视社会身份和群体形成的成本可能会导致连带责任的失败,种姓的差异和性别偏见的存在可能无法解决借款人和机构之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Rai 和 Sjöström^[37]放松了团体贷款合约的内在限制,他证明了当借款人不能履行合约时,相互汇报机制(Cross-Reporting)能够以尽可能低的成本鼓励借款人相互帮助,而这比连带责任促使借款人相互合作的成本要小得多,就是说借款人的收益不仅取决于

自己和借款人的还款,还依赖于与成员间信息的传递。另外,Godquin^[38]通过对孟加拉国87个村庄1798个借款人的贷款情况调研发现,非金融服务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表现也有着积极的影响^⑩。

四、展望与启示

农村小额信贷激励机制是确保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众多学者从理论视角对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其研究主要通过建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单个或多个代理人的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对小额贷款所造成的影响,或是从激励角度分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和思路,逐渐形成了以团体贷款、动态激励、周期还款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学者们普遍认为自我选择、共同监督、强制还款、持续融资、利率激励等制度设计是小额信贷在没有物质抵押品前提下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部分学者对于连带责任、强制还款等机制是否给机构带来预期效益从理论上提出了质疑。而在近年来小额信贷发展的实践中,很多机构逐渐放宽了团体贷款中诸如连带责任、强制还款等要求,这使得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目前,理论界对已有解释小额信贷较高还款率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进一步寻求与现实更为贴近的方法和理论来解释相关制度设计在小额信贷激励机制中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在早期研究基础上通过增加新的约束变量或放松模型的假设条件使模型的构建以及得出的结论更加趋近现实;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开始逐步关注在现有研究框架之外的其他视角或继续对传统机制深入挖掘后赋予新的内涵,使研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与此同时,小额信贷机构从之前单一使用诸如互相监督、持续融资等机制扩展到运用多种激励手段来提高机构的运营绩效和能力。另外,随着对以网络、信任、规范以及互惠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理论的关注,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研究领域逐渐从讨论如何提高机构还款率延伸到对借款人行为的关注。目前重点研究集中在嵌入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信任、网络和互惠性四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多采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这也为已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需要强调的是,消极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强化团体的排他性,甚至出现合谋隐藏信息及行动等问题,如何防止合谋情况的发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另外,目前绝大多数文献仍主要围绕对借款人的激励展开分析,而忽视了对机构内部员工的管理或激励^⑪,这也是今后学术界可尝试研究的内容。

^⑩作者没有进一步讨论非金融服务带来的成本上升对机构的影响以及到底应由机构本身或其他组织(如NGO)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⑪实际上,信贷员的努力程度直接影响着借款人的还款能力。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已步入了新阶段,不同类型的小额信贷机构试点和相关业务的开展逐步成为中国农村信贷政策新的亮点。尽管小额信贷在部分地区的试点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可实行、可复制、可推广的激励制度。小额信贷机构应意识到多种激励机制的组合对于借款人行为和选择的潜在影响,应结合中国国情与地方实际情况,考虑提供更为灵活的贷款技术和合同以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以及机构的运营能力。与此同时,机构还应加强对内部激励机制建设及员工激励,设计合理的绩效考核与薪酬制度设计。

近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速转移和流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逐步增多,人员流动频繁将导致以人口稳定居住为前提的传统激励机制的失效,因此,可考虑建立跨地区和跨机构的动态激励机制。由于农民居住的高度分散、收入的季节性波动和不稳定性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小额信贷的风险累计与形成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差异,要进一步加强小额信贷风险管理,建立风险转移和分担机制,针对其特点开发针对小额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技术以及多项政策相互配合的组合。在中国广大农村,存在于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熟人关系”等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在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机构可利用借款人间的社会资本积极培育农户自我管理、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用以促进经济或非经济活动,以此来降低借款人的偿还风险。这也将有助于建立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并实现农村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CONNING J. Monitoring by delegates or by peers? Joint liability loans under moral hazard[R]. Working Paper, 2005.

[2] AHLIN C R, TOWNSEND R M. Selection into and across credit contracts: Theory and field research[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7, 136(2): 665-698.

[3] MAITREESH G, GUINNANE T W. The economics of lending with joint liability: Theory and practic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60(1): 196-228.

[4] GANGOPADHYAY S, GHATAK M, LENSINK R. On joint liability lending and the peer selection effect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5, 115(506): 1005-1015.

[5] CHE Yeon-Koo. Joint liability and peer monitoring under group lending [J]. *Contributions to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02, 2(1): Arthical 3.

[6] ABBINK K, IRLENBUSCH B, RENNER E. Group size and social ties in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J]. *Economic Inquiry*, 2006, 44(4): 614-628.

[7] TASSEL ERIC VAN. Group lending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60(1): 3-25.

[8] MAITREESH G. Group lending, local information and peer selection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60(1): 27-50.

[9] REMCO van EIJKEL, HERMES N, LENSINK R. Group lending and the role of the group leader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1, 36(3): 299-321.

[10] CASON T N, GANGADHARAN L, MAITRA P. Moral hazard and peer monitoring in a laboratory microfinance experi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12, Forthcoming.

[11] TIMOTHY B, COATE S. Group lending, repayment incentives and social collateral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5, 46(1): 1-18.

[12] AHLIN C R, TOWNSEND R M. Using repayment data to test across models of joint liability lending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517): 11-51.

[13] EGLI D. progressive lending as an enforcement mechanism in microfinance programs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8(4): 505-520.

[14] TEDESCHI G A. Here today, gone tomorrow: Can dynamic incentives make microfinance more flexibl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80(1): 84-105.

[15] KARLAN D, ZINMAN J. Observing unobservables: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with a consumer credit field experiment [J]. *Econometrica*, 2009, 77(6): 1993-2008.

[16] GHOSH P, RAY D. Information and enforcement in informal credit markets[R]. Working Paper, 2001.

[17] ANIKET K. Sequential group lending with moral hazard [Z]. Working Paper, 2007.

[18] CHOWDHURY P R. Group-lending: Sequential financing, lender monitoring and joint liabilit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7(2): 415-439.

[19] CHOWDHURY P R. Group lending with sequential financing, contingent renewal and social capital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4(1): 487-506.

[20] MIRIAM S. Sequential Lending: A mechanism to raise repayment rates in group lending? [R]. Working Paper, 2009.

[21] 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 393-410.

[22] 章元. 团体贷款下可能扭转的“信贷配给”机制[J]. *世界经济*, 2005(8): 60-80.

[23] ARMENDARIZ de AGHION B, MORDUCH J.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24] FIELD E, PANDE R. Repayment frequency and default in microfinance: Evidence from India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8, 6(2-3): 501-

- 509.
- [25] BHARAT B, OGDEN S. Group lending and individual lending with strategic default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91(2): 348 – 363.
- [26] BAUER M, CHYTILOVÁ J, MORDUCH J.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microcredit: Experimental and survey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R]. Working Paper, 2010.
- [27] HISAKI KONO. Is group lending a good enforcement scheme for achieving high repayment rates? Evidence from field experiments in Vietnam[R]. Working paper, 2006.
- [28] GINÉ, XAVIER, JAKIELA P, DEAN KARLAN, MORDUCH J. Microfinance games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0, 2(3): 60 – 95.
- [29] LAFFONT J-J, REY P. Moral hazard, collusion and group lending, industrial economic institute[R]. Working paper, 2003.
- [30] CASSAR A, WYDICK B. Does social capital matter? Evidence from a five-country group lending experiment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10, 62(4): 715 – 739.
- [31] GROOTAERT C, OH G-T, SWAMY A.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Burkina Faso [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02, 11(1): 4 – 38.
- [32] PRONYK P M, HARPHAM T, BUSZA J, et al. Can social capital be intentionally generated? A randomised trial from South Africa [J]. *Social Science&Medicine*, 2008, 67(10): 1559 – 1570.
- [33] FEIGENBERG B, FIELD E, PANDE R. Does group lending increase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ia[R]. Working Paper, 2009.
- [34] KASARJYAN M, FRITZSCH J, BUCHENRIEDER G, et al. Repayment performance under joint liability borrowing. Does social capital matter? Evidence from Armenia[R]. Working Paper, 2007.
- [35] HEIKKILÄ A, KALMI P, RUUSKANEN O-PA. Social capital and access to credit: Evidence from Uganda[R]. Working Paper, 2009.
- [36] CHATTERJEE P, SARANGI S. Social identity and group lending[R]. Working Paper, 2004.
- [37] RAI A S, SJÖSTRÖM T. Is grameen lending efficient? Repayment incentives and insurance in village economie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4, 71(1): 217 – 234.
- [38] GODQUIN M. Microfinance repayment performance in Bangladesh: How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loans by MFI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4, 32(11): 1909 – 1926.

The Progress and Inspiration of Microfinance in Incentive Mechanism

WANG Rui^{a,b}, LIN Jian^b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Microfinance incentive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comb and conclude the mechanism and the role of rural micro-credit through the group loans (self-selection, co-supervision, and mandatory repayment), the dynamic incentives (continued financing, interest rate incentives), cycle repay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duction system.

Key words: microfinance; excitation mechan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傅旭东)